

学 | 术 | 史 | 丛 | 书

王 风 著

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

——中国近代文学论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学 | 术 | 史 | 人

王 风 著

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

——中国近代文学论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 中国近代文学论集/王凤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

(学术史丛书)

ISBN 978-7-301-25603-9

I. ①世…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2373 号

书名 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

著作责任者 王 凤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603-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467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8.75 印张 300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学术史丛书”总序

陈平原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其实,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起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已着先鞭,更不要说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于国外,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国文艺学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学》,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

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当初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只是其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今人之谈论“学术史”,自然也不会以“二十世纪”自限。本丛书不只要求打通古今,更希望兼及中外——当然,这指的是丛书范围,而不是著述体例。

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1998年8月4日

前言

这是临时起意编出的一本书。因为总觉得还没有做够做足,原是不曾有这样的打算的。师友不断的敦促,使得它或许未足月就生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勉强凑出,也不是不可以。一方面生性疏懒,一方面兴趣驳杂,使得所有事情总显得格外难以全功。加上编辑《废名集》,占用了十二年间相当部分的精力,则真正被认可为“研究”的,其所能够使用的时间实在也不能算多。而好玩的话题总是纷至沓来,自己的意志力又极为薄弱,不免这里来一点那里弄几下。到得需要收拾时,却发现到处线头,一地散碎。虽然或许多少都有点儿价值,但像我这样的,总不能全部打包,自以为有资格编“文存”。

也只有汇集此处的这些文章,还算自成系统,也是自己相对投入较多思考的结果。仔细检阅,这些文章的写作前后有十多年,除了再度证明自己的荒唐废时外,还发现主要想法其实一直没什么变化。这固然可见多年来的未曾进步,但换个角度,也说明原初的一些立场,至少在我自己这儿,总算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说起来,进入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并非什么志趣使然。最大的缘由,恐怕还是与夏晓虹、钱理群、陈平原等几位老师原先熟悉,并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接纳。二十年前回北大中文系,陈老师作为导师开始指导我,这算是我“研究”的开始。自然,本书所涉及的诸多话题,也是陈、夏的主要研究方

向,这可以说是师承的结果。至于钱老师,则是《废名集》的始作俑者。还有就是因特别的缘由而结缘的木山英雄先生,方法上我是受到他的一些影响的。当然,更多的同道,尤其是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诸多前辈、同事,对我的帮助不可缕述亦不可尽述。或者说,包括本书以外的,我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对师友的“践约”吧。

我所在的这个学科,称为“现代文学”。但其实我的基本困惑,都是这个学科所以构成的几个前提。首先,“现代文学”和“新文学”,在大部分使用场域,这两个概念可以互相替换,不过二者究竟是一物还是两物?如果是两物,那相互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其次,“现代文学”是相对于“古代文学”而言的,那么现代的和古代的,这两个“文学”是一个东西吗?再次,“新文学”是相对于“旧文学”而言的,那么所谓“新”指的是什么?最后,“新文学”号称以白话代文言,而白话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凭什么说这时候才“代”?当然可以说这时的白话与古代的白话不同,但那究竟又不同在哪儿?

因此说到底,我这么多年所希望弄清楚,就是自己身在何处。本书绝大部分内容是“新文学”的前史,所谓“近代文学”,其实是以之为工具,试图借此回答所谓“现代文学”或“新文学”究为何物。相关问题多多少少都有我自己的判断,而其中涉及较多的,是“书写语言”问题,主要就是所谓“白话”。古典白话和现代白话,普通人凭感觉可以一眼区分,但学理上如何界定,找不到满意的解释。汉语言学界,是可以借鉴的资源。不过当代语言学,主流的立场,语言学主要处理的是口语而不是书写语言的问题,形象而不准确的说法,研究的是“语法”而不是“文法”。事实上关于书写语言,语言学界投入的力量,相对来说是很少的,当然还是能看到可以归为新的“文法”现象的条目性总结。在我看来,语言学界以口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没有特别值得质疑之处。但文学界,首先要面对的就应该是书写语言的问题,因为文学最主要就是以书写语言为工具。而现实的局面,文学界基本上不去处理这个问题,或者只是表面上看似在处理此类问题。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提出了成功的解答,比较集中的相关论述是通过有关周氏兄弟的那篇文章提出来的。在我看来,汉语现代书写语言,其之所以

不同于古代的,包括白话甚至文言的书写语言,在于书写形式的改变。也就是段落、标点等,作为附加要素全面参与写作,使得文本出现不同的样貌,这首先是篇章层面的问题。几乎我们所可以观察到的新“文法”,都多少是依赖标点、段落的出现而得以实现,并部分影响到口语。

进入晚清,对于我来说,首要的是借此判定“新文学”的性质,对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的思考,是重心之一。可以说,现代书写语言是周氏兄弟等在新文学中造就的,而新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以往的文学,在工具层面上也正是由于使用的是现代书写语言,二者是一体两面。其次还有两个方面的动因,即新文学是怎么来的,当下文学的问题究竟在何处。这两个问题事实上相互关联。简单说,我觉得所谓五四“新文学”,是晚清提供的诸多可能性的最后抉择的结果。而历史的任何选择都有它不得不然的理由,也都带有它的利和弊。遗失在历史深处被废弃的路向,其主张也并非没有它的正当性。当下的文学来源于由五四开端所形成的“新文学”传统,而“新文学”这种选择的利弊,随着历史的发展会逐渐被放大。那么“法由弊生”,存在于晚清而最终遭到遗弃的各种逻辑,重新发掘出土,作为当下的批判性资源,是可以引发思考的。

书中“新时代的旧人物”,其对象基本都另有专论,置于一书,正是“人”与“文”的对观。这些文章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而成稿,同时也是另一种学术文体的尝试。我觉得历史研究,论述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叙述也是一种方法。而且好的叙述本身就是特殊的论述,横摆浮搁,置于不置可否,或者正是精微的分寸。而不同对象,所遗留的史料疏密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所考验的正是学者的“叙事”。

有时我也困惑,所谓历史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逝去的世界终究还是这个世界,我们试图去重构“真相”,固然是不可能最终成功的冲动,但或许意味着事关“公平”的努力,并不因时过境迁而放弃。如此的话,对于“过去”的追究,就是给予“现在”以信心,那么也是为了“未来”了。要言之,人文学术的究极,无非就是世道人心。

2014年12月

目 录

“学术史丛书”总序 陈平原/1

前 言/1

“近代文学”“新文学”“现代文学”诸问题/1

为什么要有近代文学/1

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周氏兄弟路线/8

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12

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54

王国维学术变迁的知识谱系、文体和语体问题/85

林纾非桐城派说/107

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119

近代报刊评论与五四文学性论说文/170

晚清拼音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催发的国语思潮/188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210

新时代的旧人物/231

严复：书牋里的中国/231

林纾：拼我残年 极力卫道/238

刘师培：闭关谢客 抱疾著述/253

章太炎：行万四千里之后/261

王国维：“殉清”亦或“殉文化”/265

后 记/285

“近代文学”“新文学”“现代文学”诸问题

为什么要有近代文学

近一百多年的文学历史,现在被划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要是翻译起来,从英文到日文都无从措手,虽然这可以成为说明汉语精密程度的良好例证,但确确实实也是一个富有意味的“国情”。

讨论这些概念的成因,会是给人以良好启发的学术课题,但将它们与长达两三千年的“古代文学”并列,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显得烦琐。八十年代中期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就是试图打通三个时段,在新的观念背景下对已有的知识体系进行重新整理,可以说是学术史的必然。这成为十几年来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动力,尽管大部分冠以“二十世纪”的研究成果只是对各个时段进行简单的知识联缀,但仍无废于我

们对这一思路的学术前景的期待。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不管各个学术分支产生的背景是什么,一旦其知识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同样会产生自身发展的动力。一个很好的例子,洪子诚发表过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当代文学”的概念》^①,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梳理概念或是反思学科史,而且是寻找当代文学自身的特质,建立独立的叙述,并对现代文学宣告分别。而且,以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文学为重点的研究,其对象已经漫延到现代这一时段,洪先生的“保守主义宣言”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同样起到了“打通”的效果,这有点出人意料。

那么还有一个近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几个时段来说,近代文学显得特殊,在过去,近代这个时段的文学是古代文学的附件,同时也是现代文学的史前时期,古代文学史总会谈到近代,现代文学史也往往从近代起讲,看上去像是两面沾光,而恰恰由于此,“近代文学”与其他几个概念不同,它不代表一个独立的学术分支。这其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是按照两张设计图纸盖起来的建筑,尽管设计思路是一致的,但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近代文学”处于两者之间,很难解释“古代文学”何以转换为“现代文学”,因而无法构建起叙述框架。

关于这一点可以稍作分析。首先,中国古代尽管有“文学”这个词,但并没有我们现在称之为“文学”的概念,在古代只有文体的类别,没有性质统一的“文学”,各文体自相发展,各管各的事,“诗言志”“文载道”,可以互不侵犯,这一点钱锺书讲到过。到近代,西方知识体系进来,教育制度进来,于是开始整合,抽取符合要求的文体,拆拆卸卸,煮成一锅“文学”,然后追认出一个“中国文学史”来,文体在文学史叙述中虽然还存在,但上面有更大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种“体裁”的等级,成为分类的标准,我们讲每个朝代的文学史就是这么讲的,尽管碰到类似赋、骈文这种土产显得有点尴尬。其次,我们对整个文学史的看法本质上就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观念,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肯定是各个朝代的偏重,这里既有雅的,

^① 《文学评论》1998年第六期。

也有俗的,还有民间的,新兴的现代观念与沿袭已久的传统看法构成了关系复杂的妥协,但到《红楼梦》《儒林外史》之后,这一切就结束了,古代文学实际上也结束了,然后是近代,会提到龚自珍等人,但已经无法贯彻前面的思路,我们不知道这“一代之文学”是什么。再次,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的整体评价是呈马鞍形的,以唐代尤其盛唐为顶点,前面是向上的,后面是向下的,这一设计思路其实就是为五四重新上扬的旋律作准备,因而近代这一段必然是整个历史中最灰暗的。这是古代文学史一般的“技术”构成和描述方式。

现代文学是另一回事。其实在民国,现代文学和新文学是不一样的,有几本以“现代”命名的书,如钱基博的、任访秋,讨论的时段和对象并不是我们现在所习惯的,要宽泛一些;而“新文学”,是以五四前后为起点并形成传统的文学,与古代文学史由于被迫认而形成不同,所谓“新文学史”,是伴随着新文学的发展被当事人逐步地叙述出来的。到共和国时代,具体地说也就是五十年代中期,“新文学”基本上被“现代文学”替换了,这两个概念内涵的不同,《“当代文学”的概念》有详细的分析,我这里大致谈谈外部的具体原因。首先涉及的一个文件是1951年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这是在政协共同纲领的文化政策指导下建立的诸多符合新意识形态要求的课程中的一个,这份文件规定:“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等”,“新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①不过,顶梁柱换了,砖瓦还是旧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已经成型的知识体系构成了紧张的关系,当然这是需要专门论述的复杂问题。但可以注意的是,与民国时代“新文学史”多是临时课程不同,伴随着共和国的建立,它被建设成基础课程,不过这个建设是独立进行的,也就是说,并不与“中国文学史”相联系,“中国文学史”作为总名,通常指的是古代文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或者说在历史学的其他领域都有类似的情况,这关系到对传统的看法和对现代的认同问题,并不总与现实政治的变迁相关。但五十

① 《“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新建设》第四卷第四期,1951年7月。

年代初期的“新文学史”，并非“中国文学史”的扩展，而是诠释《新民主主义论》的例证，倒确实确实是政权更替的产物。到五十年代中期，情况有了变化，伴随高校统一教材的设计和编写，“新文学史”被置入“中国文学史”之中，1957年高教部公布的一份文件《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第九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剧情主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①，但叙述中用的已都是“现代文学”而不是“新文学”或别的，这主要是重新对整个“中国文学史”进行时段划分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之后有一个“现代”。在现实主义、人民性、爱国等总主题下，“现代文学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部分”，这样的叙述策略使得“新文学”“旧文学”的对立模式不再重要甚至不再适宜，所以后来的教材就基本上是“现代文学”这个最具中性色彩的名称一统天下了。到八十年代以后，权威政治的影响在文学史叙述中逐渐退隐，五六十年代被不断删除的作家慢慢回到文学史，比如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那些人，这样，我们的“现代文学”也就和民国时代的“新文学”很接近了，只是学科的名称已回不到“新文学”。而既然是“现代文学”，很自然的，我们考虑到新文学传统之外同时存在的另外的文学传统，比如旧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但由于知识体系早已形成，实际上我们是用新文学的叙事框架去吸收这个传统之外的东西，现代文学本质上还是新文学，所以不在这个传统的作家，比如张恨水，我们就比较棘手，至于张爱玲，万幸她没有把作品都发在《紫罗兰》上，否则我们简直束手无策。用这个实际上是“新文学”的“现代文学”去衔接“古代文学”，是衔接不上的：就说传统小说，我们会讲到狭邪、谴责，但五四后还在发展，就是通俗小说这个传统，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的金庸；至于同光体，至少要算到抗战前；古文一路大致也到这个时间；等等。新文学并不构成与之替代的关系，倒像是一个新发生的传统。如果我们的“现代文学”和“新文学”不是一回事，把这些包括进去，倒是能理顺与古代的关系，但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现代文学”只是“新文学”，因而它不像

① 《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8月版。

“古代文学”那样,构成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时段,它是一个可以封闭的自足的传统。

在经过“资源重组”的古代文学和具有“自足传统”的现代文学之间,有这么一个所谓近代文学,难以被“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叙述框架兼容,仅从这一点看,它有成为独立学术分支的理由。但另一方面,由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叙述策略相距甚远,“近代文学”处于两个远比自身强大得多的学术传统之间,既无法对二者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更不可能从这一领域的思考出发,影响并改变相邻学科的学术路向,这是近代文学研究长期无法取得根本性进展的直接原因。当然,它所蕴藏的学术潜能也吸引着新的研究力量。

本来,近代文学领域是有研究者的,他们实际上就是古代文学学者群体的一部分,也产生了不少让人尊敬的成果。近二十年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批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开始上溯,进入近代领域,更准确地说是进入五四以前,这当然是一支富有活力的新生力量。但事情往往是这样,我们不可能空手走上一块新的土地,以往的知识构架、思维惯性以及理论方法都会被带进去,首先我们会非常顺利地找到黄遵宪、梁启超、王国维,他们是为五四而存在的;其次如严复、林纾、章太炎、刘师培,证明任何有所变化的努力是徒劳的;至于其他,我想我们的看法和胡适、钱玄同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议论,传统诗文到那时已经什么都写不出来了,所以新文学应运而生,这类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决定论的假设是极其危险的,我可以随便举两个例子,是旧体诗方面的,四十年代周作人的“杂诗”和六十年代聂绀弩的“以杂文入诗”,在历史上都不容易找到第二例,也都成为很适宜地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文体,怎么就敢肯定它早已不行了呢?讲这些我是想说明,我们会顺着早已形成的新文学的思路进入近代,以新文学为标准论证近代,逆推近代。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扩展对象,近代文学在这种描述中重新变成一个附件,只不过掉一个方向,附在现代文学之上而已。

当然这可能难以避免,或者也是必然的过程和必要的步骤,事实只有经过描述才能成为历史,而描述必须依赖一定的逻辑。当我们扩大描述对象时,以往的思路就成为依据,从现代进入近代,很自然会变成寻找新文学的

起源,甚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起点的寻找上也不可能脱离这个模式。但问题在于,仅仅如此是无需乎所谓近代的,就像过去有了古代文学有没有“近代文学”无可无不可一样。现在我们的工作就像是——记得以前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或是笑话,说英国举办最短小说征文比赛,获奖的一篇只有两句:“女王怀孕了,谁是父亲?”——我们当然知道谁是“父亲”,就是那个叫作“欧洲”的家伙,它让我们有了“新文学”。关注一下它们的恋爱过程是必要的,但那也不过还是“新文学”而已,“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扩张而已,扩张是有限度的,当然硬来也没人拦着,只是再往上走,非弄成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不可。如此回头看看,我们目前的工作不能算太有出息。

但好像必须从这里开始,首先要“进入”近代,不过这种“进入”应该是作为“殖民者”而不是“旅游者”,然后的工作则是谋求脱离“母国”而独立,也就是说,由“进入”转而“处在”。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给研究者提供的广度是足够的,旧有文体的整合、新兴书面语的崛起,以及文学史的建构,乃至“文学”被作为概念和观念,无不出现在那时,而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作为埋没的资源,可以为我们反思现实提供依据。这些特质使得近代文学完全有可能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区别开来,说得更为明确点,有成为独立学术分支的基础,而一旦出现独有的研究思路,上引下联,将影响我们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看法。

在强调“打通”的今天,为近代文学划界而治,是有点不合适宜,不过我想,从来没有绝对的道理,现在谁都在喊打通文史哲,可一个世纪以前文史哲的分科,不也提供了现代学术发展的动力!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学术史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强势学科向邻近学科的侵入、蔓延和弱势学科的崛起、独立,同样是学术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在历史学领域很多时候体现为这样一个过程,即由强势学科在时间上的延展,转而成为弱势学科在空间上的开拓,有时还会造成强弱转换,并开始另一个相反的过程,学术便在这一起一伏中向前发展,二者相生相克、不可偏废。类似近代文学这样的弱势学科的自固藩篱,实际上也是一种“打通”,只是与强势学科由于惯性而横向扩张不同,更多体现为纵向的层次上的丰富。当然,说这些并不意味着我赞成目前对于文学史的琐碎分割,在我看来,教育体制内的“中国

文学史”，一个“古代”、一个“现代”就足够了，甚至从“生产”学者的角度着眼，这种“两分”都应该打破；但是，就学术研究的格局而言，在各种各样追求广度的“整体观”的对面，应该有足以构成对话的多元而具有深度的局部空间，学术的真正发展正有赖于二者的互相挑战，一路摔打。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概念》尽管策略迥异，却同样可以看作学术上的重大进展，这两类思路在当今研究界的并存，是非常有益的事实；而所谓“近代文学”，作为一个有潜力同时有待发展的新空间，可以加入这一格局，参与对话。

近代文学目前主要有来自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支力量，知识背景、研究方法、学术思路各不相同，比如说，总体上看，具有古代文学背景的研究者大体从文集入手，其成果多以人物派别为纲目，条分缕析，偏于“内部研究”；具有现代文学背景的研究者大体从报刊入手，其成果多以问题为纲目，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偏于“外部研究”。二者各自的利弊自是一言难尽，但正由于有这样特殊的研究格局，反而天然地存在着向不同方向、不同层面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可以相信这一领域拥有较好的潜力。当然首先是不能再让半殖民地半封建之类一统天下，也不能专门为新文学填写出生证明，而是应该共同致力于恢复这一时代的丰富性，尤其是被埋没于历史深处的思考，以及影响于后来者的“暗流”。在这方面，像木山英雄先生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①、陈平原先生的《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②，堪谓空谷足音，只可惜太少了，远不成气候。我想，至少在目前，我们为近代文学筑一道随时准备拆除的篱笆还是必要的，由于这个时段的特殊性，也许它将成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学”自身、质疑整部文学史的出发点。

（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一期）

① 《学人》第十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版。

② 《中国文化》1997年第十五至十六期。